

在传统与创新之间——中泰语文教育¹的回顾与展望

白淳²

摘要

本文简要回顾了中泰语文教育的历史与现状，分析文教繁荣与经贸、政治的关系，讨论了中泰语文教育在历史和现实中的风险因素以及教育目的，提出重视教育理念、传统和创新的观点。

关键词：中泰、语文教育、传统、创新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关于中泰语文教育合作与交流的报导时常见诸报端。例如，2013年4月2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题为“泰国中文教育创多项第一”的文章，列举了泰国开设汉语课程的学校数量，汉语学习者的数量以及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数量等。“双十万”和“桥头堡”项目的实施也经常登在报刊的显要位置，云南和广西的地方媒体尤其如此。在中国，“小语种”³似乎越来越热，由于地缘优势和两国的友好传统，泰语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热门的“小语种”之一。

媒体展示的是数字上的增长，旨在营造蓬勃发展的环境氛围。

¹ 本文讨论的“中泰语文教育”特指泰国的汉语教育和中国的泰语教育。

² 白淳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

³ “小语种”在中国有两种含义，一是指英语之外的其他所有外语，一是指英、法、德、俄、日、西、阿之外的外语。本文中的“小语种”意指后者。

泰国的汉语教育和中国的泰语教育就处在这增长的潮流之中。实际上，数字的增长有时会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中国非通用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2008 年《外国非通用语类专业学科发展调研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截止 2008 年 10 月，我国高等学校共有 46 种外语非通用语的本科教学，分布在 71 所高等院校，计 231 个专业点。我国地方院校现有从事外语非通用语种教学的教师近 450 人，在校学生 5000 余人。”其中泰语在校学生 300 余人。时至 2013 年，《云南日报》的数据显示仅在云南省“选学小语种的高校在校生逾 3.5 万人”⁴。估算下来，仅云南省高校的泰语学习者就不会低于 2008 年全国的统计数字了。

在这样一个增长的时代，能看到两国语文教育的发展是一件乐事。但作为教育工作者，因为关注的主体是学生的教育和成长，更需要对问题的诸多可能性进行思考。在泰国，“汉语热”已然成势；在中国，有人认为“小语种的春天到了”。但是，机遇总是伴随着挑战而来，学科建设、教学改革、人才市场的需求，都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学校乃至教师个体做出理性的判断与思考。毕竟，人文教育的目的在于开启智慧和引领创新，语文教育不能只侧重技能培训，只满足于外语人才市场的短期需求。

二、历史回顾与分析

实际上，中泰语文教育由来已久。对于今天中泰文教交流的

⁴ 2013 年 3 月 4 日《云南日报》第 4 版“为桥头堡建设储备语言人才——我省小语种教学规模不断扩大，选学小语种的高校在校生逾 3.5 万人”。

盛况应该如何解读，部分答案存在于对历史的梳理之中。透过对历史发展的回顾，我们或许能对今天的现状多一分深入的理解。

中国的泰语教学肇始于明代，经历了几番起落。1578 年明朝政府在四夷馆中增设暹罗馆。同时《华夷译语》中的《暹罗馆译语》也已完成编写，这是现存最早的汉泰词汇手册，也是当时用于泰语教学的教材之一。至明中后期，由于朝贡渐停，相关的泰语教育和译事也就随之衰落了。1644 年清顺治帝改“四夷馆”为“四译馆”，大体沿用了明朝的制度，“暹罗馆”即在八馆之列。1852 年，暹罗使节最后一次入贡北京。至 1903 年，会同四译馆被撤销了。1942 年，民国政府国立东方语专科学校成立，在抗战期间致力于培养包括泰语在内的东南亚、东亚、南亚诸语种的人才。1949 年，新中国成立，国立东方语专并入北京大学东语系。1960 年代，泰语教学从北京大学扩展至广西民族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广州外国语学院。1990 年代至今，云南、上海、四川等地院校也相继开设了泰国语专业。

泰国的汉语教学始于何时尚缺乏可信的考据，通常只是泛泛推测，早在素可泰至阿瑜陀耶时期，随着华人移民的增多，在华人群体内部就已开始组织汉语教育。近代史上泰国第一所华校创建于 1908 年。1921 年，泰国政府颁布《基础教育法》，华校地位合法化，被纳入泰国教育管理体系。1932 年，泰国民主革命完成，严格执行《初等教育法令》，规定汉语为外国语，加强了对华校的管制。自 1933 年起，大批华校被关闭，汉语教育进入低潮。1949

年后，本地区进入冷战时期。直至 1992 年，泰国政府才再度放宽对汉语教育的限制。随后，“汉语热”逐渐升温，尤其在 1997 年泰国金融危机后，汉语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简短回顾中泰语文教育的历史之后，以下几点值得我们关注：

1、文教繁荣与经济驱动间的关系

孔子认为，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邦国），执政者要采取先“富之”后“教之”的政策⁵。管子也说“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⁶。这大致体现了经济和文教之间的关系。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的中国移民潮、21 世纪最初十年的经贸发展，这些都对文化教育提出了要求。当“新唐人”⁷在泰国安家、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后，他们要考虑中文和传统文化的承传，这就是华校诞生的基础。1990 年代以来，中泰间贸易与经济合作的增长需要懂得汉泰双语的人才。当“懂语言”这一基本要求满足后，对人才的标准也逐步提高：要求语言精通之外，还要具备专门的业务知识，还要了解两国的状况。尤其是对两国具有文化深度的了解，有助于从业者对彼此的政策、族群心理等进行解读和判断。所以，虽然经贸是先导，但最后让交流与合作持续下去的，却不仅仅是经济单方面的动力。政治和经济的合作与发展都需要在文化的层面上占据足够的高度。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两国领导人会见时常有“中泰一家亲”的表述。时至今日，很多官方和民间不同层面

⁵ 见《论语·子路第十三》。

⁶ 见《管子·牧民》。

⁷ 历史上移民泰国不久的华人被称作“新唐”。

的交往仍然不断重复这一说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显示双方并没有进而形成更深刻、更具建设性的交流理念。中泰友好关系的延续和发展还需要时人注入更新元素。这也许要从当下对青年一代的教育做起。

2、文教繁荣与国家政策导向间的关系

纵观中泰两国近现代文教历史，国家政策的导向都产生了相当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影响。文教交流的低潮时期固然是受到意识形态冲突以及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而今日双方文教交流合作之热也仍然建立在国家导向的基础之上，主要体现在政策和资金支持两个方面。虽然早在 1950 年代，周恩来总理就提出中国的外交包括官方、半官方和民间三个层面，但直至今日，官方的主导色彩依旧鲜明，在教育交流上形成了“国强而民弱”之势。民间其实大可以在教育教学理念和资源共享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教育教学的多样化需求则决定了很难单纯依靠官方的政策推动就能大功告成。文教交流如果能够在非官方的层面上有重大的创新尝试，当是数字增长之外的另一个良好势头。

3、风险所在

意识形态的矛盾与冲突、政策的可持续性、文化民族主义、市场导向等因素都曾经或正在给中泰语文教育带来影响。例如冷战时期，泰国的汉语教育曾被符号化，与共产运动捆绑在一起，在泰国几乎成为一种禁忌。当下的教育工作者需要奉行教育教化的理念，其视域要比媒体反映出的量化增长更加深远，对未来的

发展进行全面思考和筹划。执著于教育理念才能不为时利所驱遣，才可能在未来中长期的发展中做出前瞻性的规划，才能面临艰难的环境也不忘坚守。不要忘记，中泰语文教育曾经历过低潮时期；而每一次文化教育的危机过后，出来重整局面的多是当年的文化守护者。

4、中泰语文教育的目的应在于文化融合。

当经济有了基础，也希望文化软实力能形成相应的影响，这种诉求应该得到理解。中国渴望“走出去”，于是有了“走出去”战略——文化走出去，学术走出去。但同时，文化交流又是双向的，中国也需要加强对别国的了解，这就涉及文化融合的思路。教育合作与交流并不仅指师生互派互访，合作开展学术项目或执行备忘录中其他的合作意向。交流的关键在于要愿意走入外部世界，以开放的心态理解他者。

虽然中泰语文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已经超过 20 年，仍然处在探索阶段。古往今来文化的传播自有其规律，并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尤其不能指望文教建设像经济那样在较短时间内就修成正果。单纯数量的增长很难作为文教传播与影响力评测的标准。例如，近年中国对外汉语推广方面推出了不少文化读本，翻译成包括泰文在内的多种文字。这些读本虽填补了一时的空白，但由于编撰时间较短，或者由于编写者对中外文化差异体会不深，目标读者定位不够明确，而显得还不够理想。只能做到使人“知之”，难以实现使人“好之”。懂得注入审美情趣，有知识含量，有思想智慧

的引导，有对人本的尊重与关怀，教材编撰的效果就会不同。实际上，汉语教育在泰国的推广只是 1990 年代以来的事，但文化典籍的传播则在整个冷战时期都没有中断过。只要我们认真整理爬梳，不难辨清其中的规律。

三、问题与建议

1、关于理念

通过对近几年泰国—东南亚汉语教学及中国泰语—非通用语教育研究的成果的研读，笔者发现许多研究者总结出的问题大致相仿：一是合格师资的匮乏；二是课程、教材的欠缺。例如，迄今没有哪一所中国高校能够编撰出涵盖语言技能、文化知识、导入国别研究意识的本科泰语教材。研究泰国汉语教学的研究者往往还提出泰国中小学和高校汉语教学缺乏连续性的问题。很显然，这是教育和学科发展环节的问题。当观察得出一致或接近的结论，建议也就应运而生了。那就是发展师资，开发教材，进行教育教学的改革。

但是，我们要处理的又不是单纯的外语教学问题，往往还涉及教育的理念。理念上的突破确实需要从国家层面到教育工作者个体进行反省和判断。例如，关于汉字繁简问题的再思考。我们有理由期待着能够确立一套适用于两岸三地乃至更广泛的汉文化圈的汉字标准。这里不是讨论是否恢复繁体字的问题，而是呼吁一种更加国际化的视角。“识繁写简”具备成为共识的基础，对繁

简两种极端意见进行了调和，具有对文化传统的关照，且具备在现实中的可操作性。但“识繁写简”却迟迟未能在中国进入基础教育的施行阶段。对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汉语教师或志愿者来说，汉字的繁简可能是一个并未得到应有重视的话题，而他一旦置身于国际汉语推广的语境之下，就不难发现汉字繁简问题的重要性。至少在泰国，繁体字仍然为主要的华文报纸和相当一部分教材及工具书所采用。并且，不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国外，当语言文化的教学发展到一定深度，对文化经典的研究就成为必然。其实，问题并不复杂，先来厘清教育目的，答案也就豁然开朗了。当教育者秉承着教化为本的理念，很多问题的探讨和实践会顺利许多。

2、关于传统

在中国的泰语教学（也包括其他东盟语言的教学）面临着应用和学术之间的选择。越来越多的外语教师发现并相信语言只是工具，它需要与某种专业相结合。这种结合可能意味着对语文教学特有的文化价值、人文价值的舍弃或牺牲。例如，古典文化的传授无论从师资、教材还是学生的意愿都面临着较大问题，相关课时被不断压缩，转换为更加“实用”的课程。其实，强调“实用”未必意味着对人文价值的疏离或放弃。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从未接触过《论语》、唐诗或是《红楼梦》；同样，我们也不能说，一个讲流利泰语，通晓进出口贸易，却对兰甘亨国王、顺通蒲、瑙瓦拉·蓬派文一无所知的中国人，能够建立对泰国社会和民众的深刻理解。

在汉语教材方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自 2011 年起，包括商务印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等名社在内的 10 余家出版社重新影印出版了 70 多种民国老教材，从修身的公民课本到国文，林林总总，畅销之势至今不衰。这些几乎是百年前的老教材的重新出版，其实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教材除了容纳知识，还涉及思想的教化，涉及对学习者的关照。和我们当代的教材相比，民国老教材最大的特色就是人文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成分的结合，可视之为传统的现代化。

3、关于创新

目前，中国外语教学有两个值得重视的发展趋势，一是与某种专业范式——通常是跨学科研究和区域研究相结合；一是创新创业理念的提倡。

区域研究在中国虽然是近年的提法，但其实区域研究的开展在国际学术界已有半个多世纪了。而新的学术范式不一定和学术传统完全割裂开来。例如汉学和中国研究，传统的汉学方式也是力求打破学科间的壁垒，做中国文化研究的“通人”，和跨学科研究的治学方法有近似的地方，差别只是侧重古典还是侧重当下而已。理想中的语言结合专业的教学模式其实早就曾经实践过，无论抗战时期的国立东方语专还是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都曾创建过成功的模式。

2011 年，中国教育部出台了“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鼓励学生面向社会需求，发挥创造力、想象力，通过所学创造社会

价值。这既对人才培养在创新创业方面提出了要求，也对我们的教育教学改革带来了启示。至少在语文教育方面，我们还缺乏培养创新型、创业型人才的经验。

谈起中泰文化交流，许多人愿意举出泰剧或《泰囧》这样的例子，仿佛中泰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成果就来自流行文化，只有流行文化才有吸引力、生命力。其实，泰国翻译界一直保持着对中国文化经典的关注。而中国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也曾翻译出版了许多泰国文学经典。非常遗憾的是，这个传统没能在中国保持下来。泰国的佛教文学、诗歌乃至宗教哲理和实修类的书籍、音像制品都是独具特色的文化产品，也蕴含着真正的市场价值，但却很少有人关注并提出优秀的策划。我们虽然培养了数以千计万计的外语人才，却鲜见他们在文化传播和文化创意领域发挥重大的作用。这是否因为，在我们的语文教育中还欠缺某些激发创造力、想象力的元素，以致让学习者看不到文化应具有的光彩？

文化的交流历来是公平的。就像佛教来自印度，禅宗却在中国得以开创；中国古代文化深深地影响过日本，而日本文化也在近世对中国有所反哺。关键恐怕在于谁真正掌握了从传统中创新的能力。

四、结语

中泰语文教育肇始于经济发展的刺激，并有着政府决策上的先导。这是文教发展的先声。当文化教育走过了发展的最初阶段，

我们有理由期待着文化创新和文化融合。1980—1990 年代，是中泰双方恢复和发展教育合作与交流的阶段。可以说，语文教育成果卓著，文教事业的基础已经铸就了。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在官方政策层面上，还是在学校、院所的实践过程中，都形成了注重量化增长的趋势。教育合作与交流如果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培养真正的创新型人才，就必须超越量化增长的阶段，回归人本教育，回归经典教育，走向传统与创新的结合。而作为从教者，则面临着选择成为教育者还是培训师的理念问题。

中国政协委员、北京国际信息协会会长王宪鹏在论述“中国与东南亚的民间外交”时提及海外华人的影响力和作用，希望他们不仅成为中华文化的“守望者”，更成为最有效的“传播者”⁸。从文化的“守望者”到文化的“传播者”，这是一个有趣的视角，暗示了文化从传统到创新的可能途径。经历了漫长的冷战时期，经历了意识形态的冲突，当中泰文化教育进入恢复期，就以一种迅猛的势态发展起来。这后面是怎样的原因呢？因为文化并没有被意识形态完全阻隔，仍然以某种方式延续着。

2008 年，笔者在曼谷泰国国家图书馆架上看到过一部与众不同的“书”，那是一整套《三国演义》的泰译手稿，字迹工整，抄满了几厚册笔记本。这是一位不知名译者的“赠书”。他在留言中声明自己是中国语言文化的爱好者，并留下了联系方式，称如果有人能够资助出版，他愿意放弃译者的权益。看着一摞厚厚的十

⁸ 王宪鹏，“中国与东南亚的民间外交”，《公共外交季刊》2011 冬季号，第 6 页

六开笔记本，不难想见译者耗费的时间与精力，而译者自云愿意放弃他的译者权利。在所有泰国华人子弟只能在小学学习四年中文的时代，大概很少有人是为了将来的名与利来完成学业的，更多的坚守是出于对文化或有意或无意的护持。而一旦时机成熟，这些守望者也成为了最早的传播者，正像人们所认可的：机会只属于有所准备的人。这种准备不纯粹基于利益，更根植于理念。我们不妨扩大一下描述的范围，不仅是泰国华人，也不仅局限在汉语言文化教育，每一个从事文化教育的人都可能是文化的守望者和传播者，都可能在心中怀有护持的善念。超越量化增长，文化教育的交流才会更充分、更持久。这需要对传统的价值重新评估，需要关注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具备文化融合的理念。

参考文献：

- 巴 萍. (2003). 泰国华文教育现状,《国外汉语教学动态》第4期。
- 刘红军. 孙伯君 (2008). 世存“华夷译语”及其研究,《民族研究》第2期。
- 穆凤良. (2004). 四夷馆与同文馆名称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第19卷。
- 韦红萍. (2012). 明清时期的东南亚语种人才培养,《东南亚纵横》第7期。
- 张文德. (2009). 从暹罗馆的设立看明朝后期与暹罗的文化交流《东南亚纵横》第11期。

ประพิน มโนมัยวิบูลย์. 2550. “พัฒนาการของ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
ภาษาจี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วารสารอักษรศาสตร์ จุฬาลงกรณ์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 ฉบับภาษาไทย-เทศ: 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 ปีที่ 36
ฉบับที่ 2. หน้า 64-81.

ABSTRACT**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Review and Prospect of
Chinese-Thai Language Teaching****Professor Bai Chun**

This article briefly reviews the history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Thai language teaching, it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gressive teaching, trade and politics. It discusses the risk factor and the teaching objective of Chinese-Thai language teaching historically and currently, and also proposes the prospective that values the teaching concept,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Keywords: *Chinese-Thai, Language Teaching, Tradition, Innovation*